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

1644—1945年的中国

Law, Resources and Time-space Constructing

China in 1644-1945

第三卷 军事战争

张世明◎著

广东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

1644—1945年的中国

Law, Resources and Time-space Constructing

China in 1644-1945

第三卷 军事战争

张世明◎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 年的中国（一至五卷）/ 张世明
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8
ISBN 978-7-218-07721-5

I. 法… II. 张… III. 中国历史—研究—1644 ~ 1945
IV. ①K249.207②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2738 号

FALÜ ZIYUAN YU SHIKONG JIANGOU; 1644—1945 NIAN DE ZHONGGUO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 年的中国
张世明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曾 莹

责任编辑：卢家明 柏 峰 林 冕 张贤明 陈其伟
特约编辑：喻春兰
装帧设计：新角度
责任技编：周 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218-07721-5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119 字 数：3050 千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39.00 元（全五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 89667808

目 录

第一章 18 世纪中国与西方军事文化的比较	001
引 论	001
第一节 18 世纪西方对中国军事的认知	012
第二节 军事文化：18 世纪中国与西方的比较	026
一、王道与霸道	026
二、谋略与技术	031
三、不同的轨迹	039
第三节 大战略：18 世纪中国与西方军事政策的 重新审视	052
一、以西北为战略重点	062
二、以蒙古为长城	066
第二章 清政府军队建设的得失与成败	069
第一节 18 世纪中外军事指挥中枢机构	070
第二节 18 世纪中外军队建设概况	082
一、建军思想	082
二、兵役制度	087
三、组织编制与总兵力	096
第三节 驻防与班兵制度	113
一、八旗驻防制度	113

二、班兵制度	122
第四节 清军在 18 世纪开始趋于衰微的历史原因	130
一、八旗衰落的原因	141
二、绿营衰落的原因	147
 第三章 军事经济探析	 154
第一节 八旗与绿营的俸饷恤赏	155
一、八旗与绿营将领的薪俸	155
二、八旗与绿营的粮饷	161
三、战时俸饷的支给	163
四、红白事例银	167
第二节 后勤保障体系	170
一、军行与交通运输	173
二、粮草的筹措供给	187
三、医疗卫生保障	199
第三节 18 世纪财政与军事的相关关系	201
 第四章 武器装备差异的比较研究	 218
第一节 兵器的种类、性能及制造	220
一、冷兵器的延续	221
二、火器之一：单兵枪械的演进与变革	224
三、火器之二：中西火炮技术的对比	230
第二节 武器装备的管理与配属	236
一、武器装备的生产管理	236
二、武器装备的仓库储备管理	241
三、武器装备的配属管理	242
第三节 18 世纪中国武器装备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	247
一、冷兵器退出历史舞台的艰巨性	248

二、注重火炮的机动性	251
三、提高火器射速的尝试	253
第五章 18 世纪中西方海上武装力量的历史省思	271
第一节 舰船的制造和性能	271
一、舰船的修造	272
二、舰船的种类	279
三、舰船发展的趋势	285
四、舰船性能的差异	287
第二节 18 世纪中西方海军发展特点的异同对比	292
一、地理环境	292
二、海军战略	298
三、海军建设	300
四、海军战术	314
五、通信联络	321
第三节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分析 18 世纪中国海权意识 淡薄的原因	325
第六章 清政府驱准保藏的用兵得失	341
第一节 驱准保藏的用兵得失	342
一、达木之战	343
二、拉萨之战	345
第二节 清政府平息罗卜藏丹津之乱军事行动的特色	354
第七章 雍正朝对准噶尔的战争	365
第一节 清、准双方的战略形势与作战部署	366
一、战略形势分析	366
二、双方战略意图分析	368

三、双方作战部署	369
第二节 西路战况	370
第三节 北路和通泊之战	375
第四节 准噶尔军队在额尔德尼昭中的失利	379
第五节 战争中若干全局问题的辨析	383
一、雍正帝用人问题	384
二、车骑营问题	386
三、军队内部团结问题	387
第八章 乾隆朝对准噶尔、回部的战争	389
第一节 第一次对准噶尔部战争	389
一、准噶尔部内讧	389
二、清朝出兵决策经过	398
三、第一次准噶尔之役得失分析	403
第二节 乾隆朝第二、第三次平准之役	412
一、阿睦尔撒纳之叛	412
二、青滚杂卜之叛	429
三、准噶尔诸台吉的反复与第三次平准战役	439
四、第三次平准战役的特点	444
第三节 平定回部之役	454
一、大小和卓的叛乱	454
二、库车之战	465
三、黑水营之围	470
四、清军在帕米尔高原的追击战	475
第九章 金川战争	480
第一节 引发金川之役的原因	481
第二节 第一次金川战争	491

一、张广泗和讷亲之钝兵挫锐	493
二、第一次金川之役的结局	502
第三节 第二次金川之役	509
一、战事再起	509
二、木果木之战 (li mgovi dmag vkhrug)	518
三、清军之重整旗鼓再战	524
第四节 对两次大小金川之役的总结	529
第五节 金川战争与西方国家	545
 第十章 驱廓保藏战争	550
第一节 藏廓矛盾的由来	550
第二节 清军第一次援藏	563
第三节 藏廓议和活动	570
第四节 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	579
一、1791 年 7 月扎木事件	579
二、廓尔喀军队对札什伦布寺的抢掠	582
三、福康安自青海入藏	588
四、聂拉木之役	597
五、济咙之役	599
六、热索桥、协布鲁、东觉之役	602
七、甲尔古拉山之战	607
 第十一章 军事与法律：社会控制技术变革的资源	619
第一节 空间展示：人犯勾决的法场象征意义	619
第二节 福柯规训理论的启发：军事与法律的关联	640
第三节 进一步的申论：社会控制技术变革的资源	658

第一章 18 世纪中国与西方 军事文化的比较

引 论

在众多的教科书、通俗读物乃至研究论著中，经常有这样一幅场景：在广东，英国人为了倾销鸦片烟，不惜远涉重洋来到大清帝国的家门口兴兵构衅。而此时的道光帝颀颀懵懂，从小生长在深宫，主掌国家后整天埋在奏章的海洋里，对外面的世界浑然无知。他向大臣打听英国：“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这被作为反映天朝心态的令人发噱的中国近代“史景第一”。历史学家进而痛心疾首地评论说：一个国家首脑竟然对一个将要鲸吞他的国家的敌国一无所知！道光帝壅塞鬲闭，不通外情，强敌打上门来却竟然莫知其方向！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出语如稚子，盈廷惘惘，愤愤乃尔，这仗可怎么打？打了又焉得不败？

上述广泛流传的故事的最初版本估计应该始于魏源《海国图志》。^①当代历史学家通过考证发现，比魏源《海国图志》更为可信的遗留性史料是 1842 年 5 月 1 日道光帝谕旨。道光帝在此谕旨中问道：“著奕经等人详细询以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其余来浙之孟加拉、大小吕宋、双英（鹰）国人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该女主（指维多利亚女王。——引者注）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②1842 年 5 月 15 日，道光帝在给台湾总兵达洪阿的谕旨中又问道：“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除噶鼎查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职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③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都在思考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人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三，“大西洋·欧罗巴洲”，上海书局光绪二十一年石印本，页六。

②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百六十九，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60—1970 年版，第 6595 页。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十六，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1752—1753 页。

③ 姚莹：《东溟奏稿》卷三，页四十六，《中复堂全集·东溟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七十四辑，733，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24 页。亦载王之春：《清朝柔远记》，赵春晨点校，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215 页。文字上略有不同的记载见吕思勉：《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 页；孙承泽等：《台湾关系文献集零》，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一辑，503，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84 页。

侵面前落后挨打的原因。这位年轻时曾经在大理教攻打紫禁城时擐甲执兵、用鸟枪进行还击的皇子不是没有胆略的，这位登基后力行节俭而穿打补丁衣服的皇帝不是不励精图治的。事实上，正如其自我总结的那样，道光帝的确夙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通过他的努力，西北地区张格尔的叛乱卒被底定。这不能不说在武功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处。道光帝堪称一个生不逢时的悲剧性人物。因为他在位期间，内忧外患，飒沓鳞萃，而且他更是碰上了中国划时代巨变的鸦片战争，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头号当事人，中国近代史便是以他的年号——道光二十年为起点。由于鸦片战争导致的丧尊、丧权、丧地，在近代史的记述中，难免夸大了他颀颀虚骄的一面，有点漫画化。在道光帝的这两道半个月内接连发出的谕旨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这种询问是很正常的信息搜集，所以实录馆等政府官员在编纂过程中毫不隐讳地将这两道谕旨节录入史。但在当今历史学家的解释中，这便被涂上了几分荒唐与滑稽的色彩，传为笑谈，成为其暗昧至极的铁证。

无独有偶，与道光帝打听英吉利消息的情景可以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1959年3月17日，达赖在西藏叛乱失败后在亲友陪伴下出逃。这次星夜出奔引发谍报界一些最离谱的故事。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的“黄金眼”一直注视着西藏叛乱活动的发展情况和达赖的行为，将详细的逃脱路线交给达赖。3月19日，中情局的加尔各答站秘密电台了解到达赖出走的绝密情报。第二天，中情局局长阿伦·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 1893—1969年）把中情局西藏问题专家约翰·格里尼（John Greaney）召到了中情局总部进行秘密汇报。让格里尼大吃一惊的是，堂堂中情局局长竟然不知道西藏在地球上的具体位置！他们两个站在一个大皮沙发前面看一幅挂在墙上的大地图，

杜勒斯叼着一支烟问格里尼：“嗯，先让我看看，西藏在什么地方？”杜勒斯随后猛地指向了东欧某处说：“这就是西藏吧？”目瞪口呆的格里尼好半天才醒过神来说：“长官，不是那，西藏在这里，在喜马拉雅山这边。”^①

历史不可以断章取义，更不可牵强附会。这是一种基本的操守。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的了解也非常浮浅，郅书燕说的情况在学术著作中仍然俯拾皆是，根本没有资格嘲笑当时的道光帝。当时的许多知名学者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了许多

① 资料来源：<http://www.newsweek.com/1999/04/18/when-heaven-shed-blood.html>，访问时间：2010年11月6日。中情局局长阿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年），从1953年到1959年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手下担任国务卿，是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最风流倜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是当时美国少有的国际法权威之一，曾多次被美国政府任命去处理复杂难决的国际争端和国际法律诉讼案件。阿伦·杜勒斯在中情局局长的宝座上一待就是8年，成为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操纵驾驭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间谍机构，参与决策、执行了美国许多重要的海外情报行动。美国中情局名声赫赫，几乎被世人视为神乎其神的机构。随着近年来一些档案的解密，美国暗中支持西藏叛乱的一些细节也浮出水面，显示出美国中情局的重重谍影。例如，1959年7月25日，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向联合国做了一个报告。该报告称：中共在西藏实行“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政策”，试图毁灭西藏的民族和宗教信仰。其实，这一“真实的谎言”之所以能够出炉，就是中央情报局厚厚的美元大钞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由来自50多个国家的法官、律师和法学家组成的组织，虽然号称是“一个非政府和非政治组织”，但它事实上是由美国情报机构在1949年创立的。从1958年到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至少向该委员会提供了65万美元的赠款。中情局局长阿伦·杜勒斯当年在面临突发事件时表现出对西藏的无知和刚愎自用，并没有成为中情局在西藏代号为“ST马戏团”（ST CIRCUS）秘密行动的致命伤。这在中情局纵横捭阖的诡谲行动中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参见骆威：《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西藏秘闻》，姚鸿主编：《中外之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今天看来比较荒唐可笑的讹误^①。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即便今天有些学者批评道光帝有点耳根子软的毛病，但道光帝的确是一个非常注重了解京城之外情形的皇帝。我们在本书第二卷就介绍了道光帝为了绥靖西域张格尔之乱召见徐松殷殷垂询的事例^②，在第四卷介绍了道光帝关注福建械斗在召见张集馨时的对话^③。据笔者阅读范围所及，许多著作中都有道光帝召见臣工时的絮絮对谈，甚至有些篇幅极大，估计这样的谈话记录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仿佛让人身临其境。如果把道光帝的各种谈话记录集中起来编纂为一部书，只要耐心足够的话，现今存世的材料是足够的，并且非常有意思。这一系列的谈话综合起来考量，道光帝不仅不能给人一种颟顸的印象，相反的，浮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不耻下问、勤求舆情的正面形象。

史学是一种综合贯通之学。历史学和哲学在西方的发展路径特别相似。这两个学科在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制建构中均是历史比较悠久的门类。17 世纪是哲学的世纪，18 世纪是历史的世纪。哲学在近代也曾经历过包罗万象的年代，出现了康德、黑格尔等诸位巨擘的庞大体系，但后来哲学也被其他学科所瓜分而沦落为莎士比亚著作中李尔王的地位，即只剩下一个乞丐的讨饭袋了^④。历史学也存在类似的发展轨迹。昔日在人文社会科学处于“大宗”地位的历史学的许多领域均被经济史、军事史、法律史

① 例如，1822 年，阮元主持纂修的《广东通志》把英吉利当成荷兰属国，把南北美洲与非洲混为一谈，把美国说成在非洲境内。就连被国人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到广东一段时间后，也还以为土耳其是美国的一部分。

② 参见本书第二卷第七章。

③ 参见本书第四卷第五章第六节。

④ 参见张世明：《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第二次全面修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1 页。

等专门史所瓜分、侵蚀，于是当初“历史世纪”（Age of History）时期的“历史不仅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且是其他学问的一种独特求知模式与方法”的艾克顿（Lord Acton，1834—1902 年）式的自信，转成追问：“历史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独特的历史方法为其他学科所不及？”^① 台湾学者张玉法指出：“各类科学都在无限扩张其范围，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扩张，对史学的威胁极大，史学家如不振作，史学将有被瓜分的可能，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将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甚至统计学家、心理学家所写的历史，史学家将只是‘东抄西凑’的人，而史学也就变成了杂烩。”^② 这种局面无疑是造成前些年大陆学术界议论颇多的“历史无用论”和“史学危机”的一个重要助因。应该看到，历史学科生存空间缩小的原因显然与历史学研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有关。首先，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常能由全体而观察部分……单知道历史，而未读过社会科学各种书籍的人，往往不识轻重，轻者说得详之又详，至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又舍而不谈，如斯著作不过历史之杂货摊而已^③。其次，历史学家在援引各种社会学理论或“模式”来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往往一知半解地袭取其他社会科学学说，与自己研究的材料作机械的结合，少见有机的结合，缺乏独立研究与实事求是之精神。^④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学者云，20 世纪中“史学”与“社会科学”

① 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2 页。

② 张玉法：《史学革命论》，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 年版，第 155 页。

③ 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第 1 册，自序，台北三民书局 1975 年版，第 6 页。

④ 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1 页。

的关系，大概只能用“夸父逐日”这句成语方足以道尽其中原委。晚近此一趋势不止不见稍息，反愈形严重。^① 史学在义无反顾地追求科学化的同时往往迷失自我，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的附庸。为了弥补史学研究的这种偏颇，年鉴学派第一代学人倡导学科整合，这成为总体史路径本身的题中之义。而年鉴学派第二代学人更是直接提出“概念化史学”的口号。在中国古代，由于经学的笼罩，传统的中国史学家莫不致力于究事以显理、垂变以显静。^② 理事无碍一向是中国学问的特征。^③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中认为，治史者绝不能只知有局部之历史，而不知有全史，不能局限于一地或一时代，不能只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和其他学科，如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等的关联。笔者在本书中之所以倡导新历史法学的研究路径，也旨在利用自身长期在这两个学科之间穿梭往来的个人学术阅历的积累，做一些积极的拓展。质言之，学科的划分不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圣物，新历史法学不满足于沿流溯源，它更应该将“理”与“变”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打破学科的界限而确立自己的形象。

总体史其实就是一种通史。这不是时间延续意义上的通史，而是古今贯通、中西贯通、学科贯通意义上的会通历史。当然，这种会通不是生硬地以今论古，或以彼概此，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m），而是要采取步步为营的推参阐述。历史研究不仅必须面对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汇问题，而且在目前的

① 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1 页。

② 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3 页。

③ 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4 页。

专史研究中也面临着综合的问题。新法律史、新政治史和新社会史的旨趣就是综合，将其他专门史的要素熔冶于一炉。法律史如此，政治史亦然。这在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已经被揭橥得非常清晰了。军事史表现最为明显。我们必须另有新趋、逸出过去的框框才可能产生新的洞见，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唯有如此，历史的深处及其复杂处，才能赖以抉出。^① 我们在研究某一时代的历史事象时，一方面要照顾到该事象在其前后时代中的纵的线索，另一方面还考察它与其同时代一切有关的事象之间的各种可能的横的关系。本书希望在根究一个问题时能够拔毛连茹，将带着泥土的根须一并和盘托出，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而不是对问题进行条块分割的肢解。虽然我们可能格于环境的限制与自身的努力，但许多有高度成就的著作已经为我们砥砺学问示以轨则。学术固然在目前不得不分途发展，但我们都是在求“道”。在过去，治经济史和治法律史、军事史的学者往往各奔前程，道不同不相为谋。本书旨在通过历史诠释学研究“作为历史的军事”，而并非单纯研究“军事的历史”，力求在将这种自成町畦的专门之学做得非常专业的同时，将军事问题的研究与政治变革、经济资源和时空感知等问题交织起来，以期达到扞毛辨骨之效。

众所周知，现代战争已不单是动用陆海空三军实施武力作战，而且还包括国家为达到战争的目的所采取的各种手段，例如外交战、谋略战、谍报战、经济战、贸易战、财政战、生产战、补给战、科学战、技术战、精神战等。这种总体战的客观趋势迫使人们不可能单纯就军事而论军事，必须研究军事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也必须在研究中动员十八般武艺进行

^① 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5 页。

一种“总体战”。只有真正做到学问门庭宽阔，才能改变军事史研究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相反，没有一定的器局，就军事史而论军事史，就可能钻入牛角，谈不到根本点上。从目前国外军事史研究的态势来看，这种综合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无疑，许多研究成果表达出来的气度令我国学人含羞生愧。美国学者小戴维·佐克（David Hartzler Zook，1930—1967 年）和罗宾·海厄姆（Robin Higham）在合著的《简明战争史》（*A Short History of Warfare*, New York: Twayne, 1966）中曾指出：“历代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对战争的研究，而偏重人类经历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职业军人的错误在于仅仅论述范围狭窄的战术问题，供其他专业人员借鉴和学习。把战争研究和社会研究分开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在许多时代里已经导致种种可怕的后果。”^①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麦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的《竞逐富强：公元 1000 年以来的技术、军队和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 D. 1000*）^② 强调“军事—商业复合体”（military-commercial complex）的概念，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阐述的英国等西方列强“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③ 的观点颇为契合。按照其论述，“军事—商业复合体”作为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异化物”，最初出现在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以后向低地国家、法国和西班牙蔓延，数百年后基本覆盖了整个欧洲。“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

① 佐克、海厄姆：《简明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 页。

② 该书的中文译本为：麦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倪大昕、杨润殷译，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魏源：《海国图志》中，卷三十七，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陈华等点校注释，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1092—1093 页。